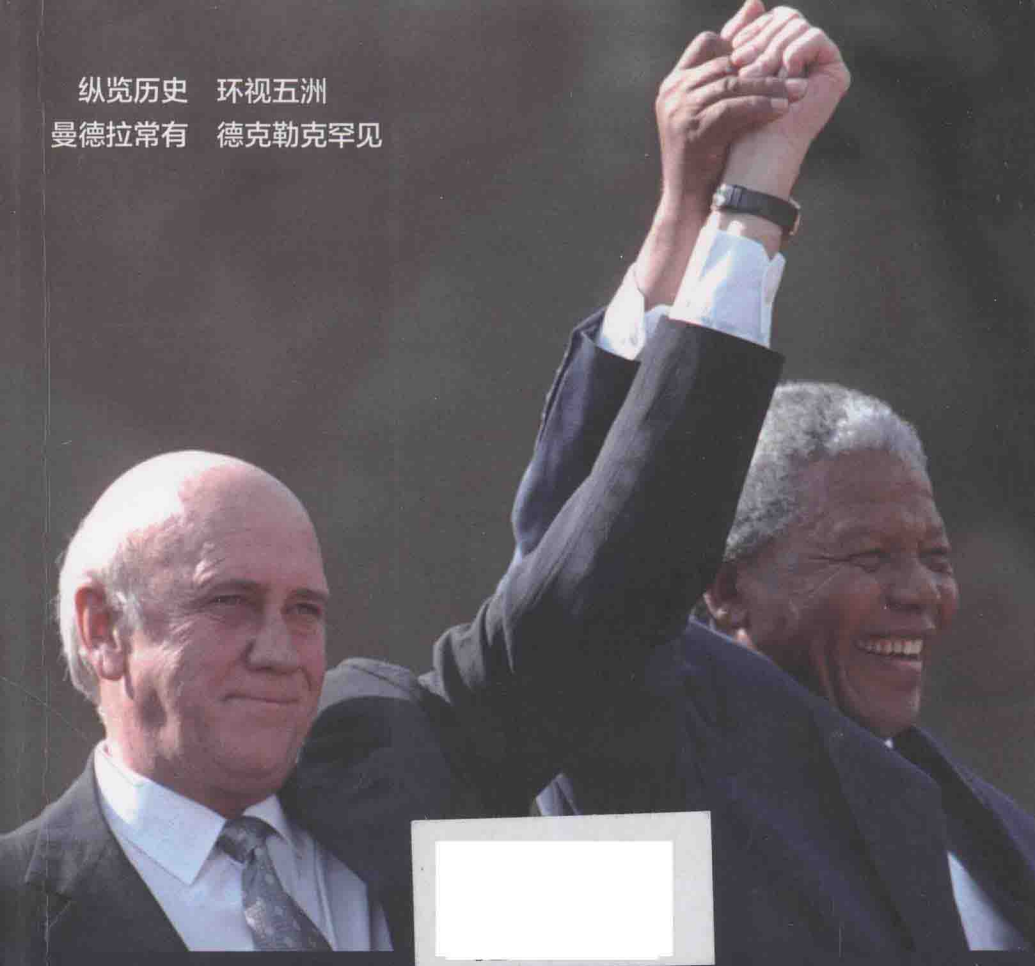


纵览历史 环视五洲
曼德拉常有 德克勒克罕见



德克勒克与曼德拉

Chained Together: Mandela, De Klerk, and the Struggle to Remake South Africa

用妥协和宽容重建南非

〔美〕戴维·奥塔韦（David Ottaway）著
启蒙编译所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德克勒克与曼德拉

用妥协和宽容重建南非

Chained Together: Mandela, De Klerk, and the Struggle to Remake South Africa

[美] 戴维·奥塔韦 (David Ottaway) 著

启蒙编译所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克勒克与曼德拉：用妥协和宽容重建南非 / [美] 奥塔韦著；启蒙编译所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书名原文：Chained together: Mandela, De Klerk, and the struggle to remake South Africa

ISBN 978-7-5520-0754-1

I. ①德… II. ①奥… ②启… III. ①政治—研究—南非(阿扎尼亚) IV. ①D7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97658 号



David Ottaway
Chained Together: Mandela, De Klerk, and the Struggle to Remake South Africa

Copyright © 1993 by David Ottaway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9-2014-789

德克勒克与曼德拉：用妥协和宽容重建南非

著 者：[美] 戴维·奥塔韦

译 者：启蒙编译所

责任编辑：李 慧 唐云松

出 版 人：缪宏才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63875741 邮编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印 刷：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毫米 1/32开

印 张：12

插 页：3

字 数：250千字

版 次：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0754-1/D·305 定价：4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199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和南非大主席曼德拉。两人为废除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和建设新南非做出了贡献。



曼德拉在狱中



1990年，曼德拉获释，结束了27年的牢狱生涯。



曼德拉出狱后，带着妻子温妮同南非共产党前任领袖、改良主义的倡导者乔·斯沃洛会面。

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白人警察驱赶黑人小孩的场景随处可见。



1990年最后几个月里，非国大和因卡塔的暴力斗争不断升级。



1992年9月7日，西斯凯军队和警察对非国大和南非共产党的游行队伍进行屠杀。





1992年9月26日，曼德拉与德克勒克的峰会达成协议——恢复和平进程。



2013年曼德拉去世，德克勒克夫妇参加了曼德拉的追悼会。

致 谢

在近3年的南非记者职业经历中,我有幸得以接触所有政治派别和各种社会地位的黑人和白人。他们的个人故事和见解或多或少地帮助我了解到了新旧南非这场永不落幕、掺杂着历史遗留问题和种族纠葛的剧目。当然,在这里我无法对所有人一一表示感谢。但我仍想提及几位特别重要的人,虽然他们对后面文章中的意见和结论概无责任。首先进入我脑海的是以下5位要特别加以感谢的南非人:阿利斯特·斯帕克斯(Allister Sparks),多年来为《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写稿,并带领我进入了南非政治的奥秘之中;《每周邮报》(*Weekly Mail*)的菲利普·范·尼克(Phillip van Niekerk);约翰·马迪森(John Matisonn),记者,1990年和1991年任职于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视台;《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约翰·巴特斯比(John Battersby);约翰内斯堡《星报》(*Star*)的帕特里克·劳伦斯(Patrick Laurence)。在外国记者中,《伦敦独立报》(*The Independent of London*)的约翰·卡林(John Carlin)给了我关于德克勒克政府运作的珍贵见解,《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克里斯·雷恩(Chris Wren)则在许多重要场合中给予了我宝贵的陪伴,我们一路走来,见证了一场又一场大屠杀。

在我认识的南非白人,我要特别感谢维姆·博伊斯(Wim

Boyce),他是比勒陀利亚的一位独立危机分析师,还有开普敦大学的赫尔曼·吉尔摩(Hermann Gilomee)。在探寻白人政权的奥秘方面,我经常求助于民主党人彼得·索尔(Peter Soal)和同在开普敦大学的戴维·威尔(David Welsh)。这里也要特别感谢同校的罗伯特·撒切尔(Robert Schrire)从许多角度帮助我揣摩德克勒克总统的性格。

在黑人的政治舞台上,我非常感谢来自路透社的里奇·默孔多(Rich Mkondo)以及尤金·那亚提(Eugene Nyati),他们给了我温暖的友谊和源源不断的帮助,后者是一位具有独立思想的政论员。当然,我肯定不能忘记经常给我帮助,与我分享见解的姆福·马修里尼(Mpho Mashinini)、莫诺·巴德拉(Mono Badela)、司马义·雷格丁(Ismail Legardien)以及莫勒蒂斯·姆贝基(Moellets Mbeki)。朱·麦甘迪(Zbu Mngandi),一位周刊城市出版社的调查记者,慷慨分享了他所掌握的广博的纳塔尔政治知识,对此我非常感激。许多南非国民大会的官员和议员也大方分享了他们所知的与政权组织相关的历史和当代事件。其中一位发言人——热情洋溢的吉尔·马库斯(Gill Marcus)——引导我进入了遭受政治暴力蹂躏的受害者世界,其中不仅有她的同事,还有身处城镇的人民。

能写成这本书,多亏了《华盛顿邮报》的编辑给我安排了半年休假,以及来自转行做了发行的老同事——彼得·奥斯洛斯(Peter Osnos)的鼓励——他自始至终都坚定不移地相信我能写成这本书。我还要感谢保罗·葛洛布(Paul Golob)和莎拉·弗林(Sarah Flynn)这两位细心周到的编辑。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将本

书编辑成型——要知道绝大部分原稿都是我在长途奔波中完成的,因为当时我正在前南斯拉夫进行新的采访任务。万分感谢他们在我奔波不定的旅途中给予我的承诺和耐心。

最后,关于发生在南非的一系列戏剧性变化,与我讨论得最多的人是我的妻子玛丽娜(Marina),她那超凡脱俗的观念和研究方法在我分析日常政治活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她也在为她即将创作的关于南非的书收集资料,我们在旅行中一起探索南非的长度和广度,追逐着南非难以捉摸的真相,这是一场无休止的冒险。

绪 论

1990年2月11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因为这一天纳尔逊·曼德拉出狱了!谁能忘记这个男人重生的笑容和难以置信的魅力?他和妻子手牵着手走出开普敦外的维克多·维斯特监狱(Victor Verster Prison)这一幕将永远定格在历史的记忆中。南非以及世界的希望降临了!世界上最糟糕的种族冲突终于有机会通过和平谈判得以解决。曼德拉致力于和谈和种族合作,这也是释放他的白人统治者——南非总统德克勒克——的政治倾向。南非的救世主终于到来了,在这个与众不同的日子里,世界各地数以万计的人们通过电视共同见证了曼德拉走向自由。

曼德拉和德克勒克迅速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誉和钦佩,因为他们着手于寻找一个历史性的和解。两个如此和平的伙伴在南非乃至全世界都前所未有,闻所未闻。曼德拉,经久不衰的黑人抵抗种族隔离的象征,即使是在监狱度过了27年也不曾对白人产生积怨和仇恨。德克勒克也因为其非凡的政治勇气和推行初级改革的魄力迅速成了与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比肩的人物。自此,曼德拉与德克勒克携手合作,试图带领他们各自的人民共同开创“新南非”的篇章。

但是3年多过去了,南非依然纷扰不断。1993年4月,一件惊天大案轰动全球——克里斯·哈尼(Chris Hani)被暗杀,他是

共产党的一位高级领袖，同时也是非国大(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全称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事实上，迄今为止种族合作的迹象依旧十分模糊，和平解决冲突的运动影响和作用也十分有限。根本性的改革难以推进，南非依旧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每天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暴力事件：黑人砍死黑人、白人开枪射杀黑人、黑人用烧灼和刺戳报复白人。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只能尽量减少对话，以免在艰难的和谈过程中引发更加惨烈的冲突。1990年2月11日的梦想宣言到哪儿去了？为何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却在逐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消亡？为何绝望吞噬了和平的星星之火？在曼德拉重获自由的荣耀之日，在这两位满怀崇高使命和理想的和平缔造者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南非，这张由激进民族和种族群体组成的复杂拼图早已发现试图赎回自身的道德价值和政治权利并非易事。全国上下450万白人在掌握了300多年的统治权后绝不会心甘情愿地将权力拱手奉还。而遍及全国的3300万黑人无论站在本土政治的忠诚立场还是出于团结民族关系的考虑，都纷纷转向内部，共同反抗白人霸主。因此，曼德拉和德克勒克的和平努力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一个个暴力炸弹击退。和平的进程一度脱轨或延迟，一年多的时间都被浪费在了指责谁该为暴力行为负责的问题上。从1990年开始，南非被卷入了其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政治暴力和犯罪浪潮之中。白人安全部队犯下了屠杀黑人示威者的罪行，非国大与曼戈苏图·布特莱奇(Mangosuthu Buthelezi)酋长领导的因卡塔自由党(Inkatha Freedom Party)也升级了他们的权力斗争以及针对彼此的屠杀行动。白人极端分子同样不甘示弱，秀出对克里

斯·哈尼的暗杀来证明他们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南非的暴力行动中出现了许多老者的身影,许多参与者的脸上伤痕累累。然而,无独有偶,这并非一场单一的大规模抗争,全世界同时还在目睹正在南斯拉夫上演的种族战争。6个月之后,波斯尼亚战争的死亡人数比自1984年开始的南非暴乱的死亡人数更高。相反,南非的杀戮虽然规模相对较小,但持续时间却很漫长。平均每天有6至10人死于城镇冲突或别的恐怖事件。杀戮的主阵地位于印度洋沿岸的纳塔尔省(Natal Province),在一片美丽的绵延起伏的绿色山丘之上,这里也是布特莱奇酋长的家乡。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城镇上,垃圾遍地的养兔场一片荒凉。人们把暴力行动统称为“大屠杀”,实际上,许多战斗往往只持续短短几日。从周边城镇搭乘火车往返约翰内斯堡的乘客也不断遭到砍刀、匕首和枪支的袭击。

每个恐怖组织的袭击风格都不一样。因卡塔的首选是伏击和滥杀,通常的攻击方式是袭击火车上、出租车里和葬礼上手无寸铁的平民。从另一方面看,非国大的支持者似乎更专注于肃清敌后。他们通常针对身份明确的或者疑似的因卡塔成员、警察以及向警察告密的人。他们毫无顾忌地烧毁房屋,给受害人戴上“火项圈”,然后点燃这些在汽油里浸泡过的轮胎。西里尔·多金(Cyril Dorkin)——我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索韦托(Soweto)黑人城镇遇见的一个非国大的街头霸王——坦白地告诉我:“我更喜欢给他们戴‘轮胎项链’,这比他们用砍刀攻击我们的方式有趣多了。”白人至上主义者经常毫无理由地攻击黑人。比如,1991年,一群白人在路易·特里哈特城(city of Louis Trichardt)殴

打了一批在市政厅门前的草坪上野餐的黑人学童。同时，白人至上主义者在韦尔科姆(Welkom)的矿业中心组织了一个自卫团，一度在傍晚将所有他们认为“看上去可疑”的黑人驱赶出白人社区。在约翰内斯堡甚至还有两三个这样的例子：白人无端地殴打或杀害一个在路上偶然遇见的黑人。警察也参与到了这场暴力行动之中，有时是在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中开火，但更多的是趁团伙相互残杀时借机施暴。

白人或多或少能合法公开地武装自己，而因卡塔的暴行主要依赖所谓的祖鲁(Zulu)“传统”或“文化”武器。这些武器包括砍刀(在南非被称为短刀)、矛和一种叫 knobkerries^①的圆头木棒。但是因卡塔党和非国大双方使用的武器很快就升级成了苏制 AK-47 步枪，他们从邻国莫桑比克走私了数以千计的武器。单是在 1991 年警察就追回了 1800 多把。当时连银行劫匪和劫车犯也使用这种枪。

西方媒体一贯专注于报道曼德拉出狱后的社会状态——南非可怕的政治暴行让整个社会结构分崩离析。然而，这些日益增多的暴力犯罪或许才是最佳晴雨表——反映一系列政治剧变所造成的社会创伤，且情况远比 20 世纪 80 年代白色政权瓦解时犯罪分子趁机作乱糟糕得多。手持 AK-47 步枪的绑匪随处可见，他们经常残杀受害者——不论白人还是黑人。1989 年至 1993 年，南非的谋杀率成倍增长，人均犯罪率为美国的 10 倍。在世界范围内同规模人口水平的城市中，开普敦的谋杀率最高。1990

^① 南非土人昔时用作武器的圆头棒。

年,官方统计全国共发生了 15100 起谋杀,其中约 11000 到 12500 件谋杀案是普通犯罪,而不是政治暴力。1992 年,根据警方统计,在南非 4000 万人口中,被谋杀的人数上升到了 19400 人,其中只有不到 2500 人死于政治迫害。

大多数犯罪和暴行集中发生在黑人社区,那里几乎没有警察巡逻,部分原因是警察也身处政治暴行的威胁之中,他们作为腐朽的种族隔离秩序的执行者,自然而然成了施暴的目标。1992 年有 226 名警察死亡,是同一时期美国警察丧生数量的 12 倍。但是在 1990 年和 1991 年,死于政治暴行和刑事犯罪的受害者中,96% 依然是黑人。城镇变成了丛林,中产阶级的黑人成了暴徒、汽车勒索者和劫车匪徒的猎物。那些住在索韦托的黑人晚上回家途经约翰内斯堡北郊的白人地盘时,时刻都处在对劫匪和偷车贼的恐惧之中。

对于白人来说,虽然他们并不慑于政治暴力,但他们的生活却笼罩在暴力犯罪的恐惧阴云之下。在约翰内斯堡的北部郊区,房屋变成了武装阵营,四周筑起了越来越高的围墙。某个社区里的居民邓克尔·维斯特(Dunkel West)甚至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围着整个社区建一堵围墙来防止小偷。房主们都买了恶狗,其中最受欢迎的是罗纳威和斗牛犬;还有许多人在外墙上安装了铁丝网或昂贵的电子设备来监控入侵者。私人保安公司应运而生,一旦房子的警报响起,他们可为房主们提供“即时武装响应”。白人越来越不愿意在夜间冒险出行。人们生活在被攻击的恐惧之中,以至于邻里之间宁愿开车去对方家吃晚餐,也不愿步行短短一段路程。“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唉,再也没有安全感可

言。”白人主办的保守派报纸《公民报》(Citizen)于1992年1月如此评论,恳求政府遏抑犯罪,以免国家“突然陷入无政府状态”。

1990年初,曼德拉和德克勒克还未曾充分意识到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障碍的严重性。尽管世界的新秩序已经建立,但国际环境非常不利于他们成功寻求和平解决。黑人民族主义政治如旋风般席卷了整个南非大地,这似乎正与当代历史潮流背道而驰。在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分裂势力被迅速粉碎之后,大多数南非黑人领袖都渴望将他们因种族隔离而支离破碎的国家重塑成一个单一制国家。尽管这些国家都希望南非能融合全国不同的民族,并将各个种族群体纳入一个统一的、没有种族歧视的国家,但是东欧的民族主义者却鼓励南非的白人领袖坚持自己的狭隘民族主义(带有严重种族主义倾向),这使得在南非境内创建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国家变得更加艰难。

同时,南非还存在着另一个危机:许多南非黑人民族主义者依旧奉行“守旧思维”。对于他们来说,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就像“解放论”的有效组成部分,虽然身处1990年,却仿佛还活在1960年。虽然当时南非政府准许共产党蓬勃发展,但世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同人却处境相当艰难。那时流行一个瑞普·范·温克尔(Rip van Winkle)^①的说法来形容新南非,即南非仿佛正从长达30年的休眠状态中醒来。相较于大多数同时代的非洲国家,南非的黑民族领袖刚刚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整整晚了30

8

^① 比喻时代的落伍者,嗜睡的人。

沉痛教训。1960年的新一代领导人的典型特点是沉迷于对权力和官职的幻想。他们的态度与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如出一辙,恩克鲁玛是1957年加纳独立运动的领导者,其座右铭是“追寻政治王国乃第一要义,世间万物终将臣服于你”。

就非洲大陆的本土条件而言,情况也非常不利于曼德拉和德克勒克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本国的冲突。各个黑人民族主义团体之间的内战已经使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在独立15年之后变成了荒地;索马里氏族之间的战斗让其沦为无政府状态;管理不当使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陷入贫困,就连津巴布韦也未能幸免,它曾一度是民族和解的光辉榜样,如今也滑向了经济灾难。

国内暴力和种族战争持续在非洲其他地区和东欧上演。在这种背景下,德克勒克和曼德拉发现很难说服白人和黑人达成种族和解也就不足为奇,那么在南非重建一个非种族歧视的新秩序也是行不通的。更糟糕的是,他们的个人关系——对于整个和平进程而言至关重要——成了暴力行为的牺牲品。他们对对方的期待和信任越来越弱,互相质疑支持对方的选民,并意识到他们对如何管辖新南非的愿景实质上南辕北辙。有时候,这两位关键性的和平缔造者似乎决心毁掉对方,他们在公共场合发生强烈冲突,谴责对方搞“双重议程”和背信弃义。德克勒克似乎无法判断曼德拉到底是他的首席合作伙伴还是首要劲敌。曼德拉似乎也对德克勒克充满了不确定。双方都指责对方“拿和平当战争的幌子”。

和平进程处处受阻,只因两位领导人未曾尊重他们最初达成的一系列协议或精神。一次又一次地,德克勒克和曼德拉带领他